

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现代性诉求

谢海燕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作为一位具有深刻现代意识的启蒙者,鲁迅将翻译活动作为他启蒙救亡的现代性诉求的工具。翻译贯穿其整个文学活动的始末,他通过大量译介国外文学作品试图给国民带来现代性思想,并重新想像中国,构建起以“立人”来“立国”的理想模式。对现代性的诉求使鲁迅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时代的边缘位置;而针对国民性改造所作出的翻译选择则充分体现了他超前于时代的现代性思想;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为革命文学寻找到真正的思想武器,也为当时的现代性救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鲁迅; 翻译思想; 现代性; 国民性; 革命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10.96

文献标志码: A

引言

马歇尔·伯曼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1]伯曼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体验,这种理解虽不能详尽现代性在西方语境里的意义,但却算得上是比较具有综合性的定义。然而,当现代性概念从西方走向东方,在中国晚清及五四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却历经了一场中国本土化的改造。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剔除了“摧毁”的内涵,围绕着“新的”“进步的”意义,将启蒙和审美的两幅面孔杂糅在同一个时空的横切面,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救亡意义。从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借“器物”实现“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想像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之后,他们转而诉求到制度和思想层面的改革,期冀借助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理念来设计中国的启蒙大业。这其中,鲁迅便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具有深刻现代意识的启蒙者。他通

过译介大量外国文学以及文艺作品来影响和唤醒中国国民,并试图构建起一个以“立人”来“立国”的现代理想模式。

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考察鲁迅的翻译实践及其作品,因为笔者以为将鲁迅的译介看作一次历史文化事件,其本身在其独特的历史时代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于我们今天在文化甄别等方面的启示,已经远远超过鲁迅译作本身的价值。因此,本文将现代性为切入点,从鲁迅的文化立场出发,探讨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革命文学的重构,这些对他人生起结构性作用的愿景和目标,是如何作为他翻译思想的隐形指导原则,并相互作用的。

一、边缘立场与其现代性诉求

鲁迅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自觉于政治权利的主流之外,自守着边缘立场。他的思想处处渗透着对传统的反叛和与时代主流的错位。他所持的边缘立场不仅体现在他对属于时代主流的东西充满了怀疑和否定上,更体现在他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上。

虽然对于当时的民族危机都身同感受,并都致

力于民族复兴大计,但是鲁迅与同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变革的体认却大不相同。当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希冀通过上层变革来介入政治,并试图改变中国时,鲁迅的改革立足点却在民间。他一方面通过文学创作和翻译介入到了政治,另一方面,他的整个人生经历又与政治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因为,鲁迅所建构的精英意识形态,并非一种“政治家的自觉的谋略”,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英意识的本能流露”^[2]。这注定了他不能走到政治的中心位置,但是也正是这样一种边缘状态成就了他超越时代的现代性意识。

鲁迅将民族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文化危机,并通过《狂人日记》最早在中国喊出传统文化是“吃人”的文化。这一举动让他与中国传统的精英群体划分了界线,并成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当然,他与传统文化的决裂不仅由于其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为其提供了新的、开阔的视野,还源于他深切体会自身也浸染在这种传统的“吃人文化”里,因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剖析和认识。因此,主流文化及在这种文化中生成的奴性成为他一贯的抨击对象。他试图通过文化引入来打破这种主流文化,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人的主体性得到强调,个性得到张扬。关于这一思想和主张,我们已经可以从鲁迅早期作品里窥见一二:如在他20世纪初写的《文化偏执论》中,他强调“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巅”,并提出要“尊个性而张精神”^{[3]55-58};而在其编译作品《摩罗诗力说》中,他召唤着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3]102}。鲁迅的这一文化立场,从思想意识的“新”和“进步”的角度来看,显然超过了同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但是这也使得他在民清交替之际,从一个时代的边缘走向了另一个时代的边缘。就晚清时代而言,他叛离了传统文化,同时也叛离了传统精英这一群体;而对于后者,正当五四知识精英们与他的文化立场将要实现对接之时,他却又一次跳出这种共同的文化立场战壕,一边极端地反抗传统,竟至发出“不看中国书”的言论;一边又对置身其中的现代启蒙工程不时持以怀疑的态度。他与五四精英群体的疏离主要体现在改造国民性的立场上。首先,主流的国民性批判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批判者希冀通过批判国民性来变革制度,从而达到再造中国的目的。而鲁迅却是浸淫其中。他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中的一个又一个小人物,以及其对弱国文学的译介,都昭示着他的民间立场和他希冀通过重塑文化来建造新的社会模式的理想。一言以蔽之,鲁

迅不是“以文学为政治教育工具”,而是“把文学看作一个民族精神本质的集中体现。”^[4]正是这样的一种现代性意识使得鲁迅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同时也边缘于时代。

那么,如何实现“立人”理想?显然,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担当起如此大任。在鲁迅这里,唯有“别求新声于异邦”^{[3]68}——通过翻译引入新的文化,借鉴西方先进文化重塑人的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人的主体建构,以此来想像一个全新的中国。

二、国民性的改造与翻译的选择

“国民性”批判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它是自晚清、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不懈追求,对启蒙国民、救亡图强所作出的不懈的努力。这股思潮起源于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自我文化的反省,他们指出了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奴性。这种“以公然叛逆的姿态”进行的文化反省,“标志着一种文化观念的更新,标志着一种民主文化观念的形成”。^[5]在这场批判中,鲁迅所追求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他“以‘个人主义’实现了对‘国家主义’的超越,以对精神信仰的呼唤实现了对‘物质主义’和单纯的实业主义的超越。”^[6]他把国民的奴性比作一种“病痛”,要“立人”,就必须与压迫人奴役人的封建传统作绝别,并且从别国借来现代性思想的火种来疗救这病痛。

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认识是深刻的,在他的整个文学翻译和创作生涯中,他不断地强化着这一认识,沿着救亡图强的主线,他的国民性改造的现代设想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在他不同时期的翻译思想中。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幡然悔悟”始于他弃医从文的决定。在他设想通过学医来帮助增强国民体质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之后,他从麻木的中国人身上看到了医生所无法医治的“病痛”,于是他寄希望于从国外盗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火种来开启民智,疗救病痛。同时,他认为首先可以举起火种,振臂呼之,或将取得燎原之势的必定是传统文化的精英阶层,即首当其冲要唤醒的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首先要联合的是先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他这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主要集中在科学小说上,同时,怀着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设想,他在1903年编译了《斯巴达之魂》,希望借这部小说来激励中国的进步青年从古代斯巴达人身上学习一种战斗的精神,积极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去。时隔五年,他又编译了介绍西

方先进诗学的作品《摩罗诗力说》,在这篇编译作品中,鲁迅分别译介了八位西方诗人,这些诗人被他称为精神界之战士,他们“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7]虽然学界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在中国诗学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作品本身所体现的对启蒙思想的倡导,对反抗精神的追求,以及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都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蕴含着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思想。此时的鲁迅,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在翻译过程中采取意译,编译,节译等手段去迎合目标语读者。在翻译科学小说作品时,他基本与时代同步,用的是浅显的半文言文半白话文的语言。直至《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在今天看来——这部译文集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称得上他同传统思想决裂之前的“最后一搏”。首先,整部译文集采用的都是文言文,可见译者心目中的读者更多的还是倾向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他希图通过上层阶级的觉醒来影响普通民众的愿望依然昭然若揭。之所以称之为“最后一搏”还因为,《域外小说集》作为鲁迅翻译作品的分水岭,在此之后,他的译文都采用了白话文,其译作的读者转向了人民大众以及同他一样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然而,这本译文集最终沦为对所谓传统精英阶层的一次费力不讨好的争取,因为其古奥的先秦古体的文笔竟连当时的知识精英们也不堪褻读,因此备受诟病;更雪上加霜的是,《域外小说集》的直译风格并没有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恰恰相反,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挑战:当时中国译介均以删减、篡改、意译为风,无论何种层次的读者群,他们感兴趣的都是林纾式的章回体小说式的译法,任何西方的东西,都要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加工和改造,才得以认可。而直译带给读者的既是文化的异质性、也是语言的异质性,这些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无法接纳的。因此,其结果可想而知:传统的和异质的元素矛盾地并存于该译文集,使得它既无法得到旧的也无法得到新的文化群体的认同。然而,读者的缺席却是一次及时的留白,它让鲁迅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在这场改造国民性的运动中谁才是真正应该予以关注的主角。

显然,从随后大批的翻译作品以及日趋成熟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人民大众成为鲁迅的作品的主要读者群。群众在他的国民性批判的话语中总是被置顶的,他既恨他们也爱他们。正是这样一种纠结的情感让鲁迅在一种绝望和反抗绝望的体验下痛

下决心,决定采取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姿态将翻译当作武器,这一立场让他在引进国外的现代思想时作出了一系列的翻译选择,概括起来称得上一种暴力的“拿来主义”。他对于现代思想的“拿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于翻译原作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拿来主义。他坚持的译本原作选择标准是对社会有借鉴作用的、对读者有益的作品,尤其是那种宣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其二,他坚持主张直译,一方面希望通过直译来达到汉语的欧化,加强白话文的改革,另一方面盗来最真实的异域火种,更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从而达到学习先进文化的目的,他所提倡的“宁信而不顺”涉及的并非简单的翻译方法问题——事实上,鲁迅的译文有时“不顺”到他自己都觉得诘屈聱牙,但他依然坚持保持这种“洋滋味”的拿来主义,如他所说: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借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8]

可见,鲁迅大力提倡直译,旨在改善白话文,追根究底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的国民代性改造的主张;其三,为“拿来主义”扫清“障碍”的破旧立新观。鲁迅的思想是否与传统作决然的决裂仍值得我们的探讨,但他执行的几乎是一种有意的矫枉过正的拿来主义却是很显然的。他的翻译作品的目标读者主要是青年,因为他寄希望于青年担当起为无声的中国呐喊的先行者的角色。他否定传统文化,认为“将来必胜于过去”,宣扬“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3]87}他鼓励青年多读外国作品,尽量地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这并非他的由衷之言,应该只是他的一种策略,即以一种全盘否认传统的强硬态度去影响青年,让他们彻底的摒弃传统,以便更有效地接受新的现代的思想。

同时,他对于儿童的关注也不逊于青年,他认为从十来岁的孩子就可以预测到20年后中国的情形。既然中国的传统的东西是他所否定的,而传统中国文化中能够教育和影响儿童的好的读物并不多,他便自觉地担当起了译介外国儿童作品的重任。除了他早期翻译的科幻小说,以及《域外小说集》里有关儿童的作品外,他还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小约翰》、《小彼得》、《桃色的云》、《表》、《俄罗斯童话》

等童话故事,这些作品的主题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既有对弱小的同情也有对强权的反抗,既有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也有对人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的忧虑。这一系列主题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儿童文学所宣扬的封建守旧的儒教思想,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作品的译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改造是何其深谋远虑,因为他比旁人更能体察到国民性改造绝非易事,必将是长期的过程,要付出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追求,这也是为什么他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儿童的教育倾注了如此大的热情的原因。总之,鲁迅每一个阶段的翻译选择都绝非偶然,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以一种谦卑的自我反省的精神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调整策略,但是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主线却从未中断过。

三、现代性救亡与“革命文学”的重构

鲁迅晚期(1929—1936)对苏俄文艺理论作品的大量译介是他对现代性的不断怀疑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他翻译思想发展的巅峰之期。在他重新认识文学和革命理论问题的过程中,翻译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因为他“关于文学和革命的思想主要来自阅读和翻译外国书刊”。^{[4]154}同时,对这些文艺理论的翻译成为鲁迅真正廓清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重要手段。因此,正如摒弃翻译,我们将无法理解他的革命文学思想与现代性救亡理念一样,摒弃了后者,同样,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其翻译思想与其现代性诉求之间的理论联系。

首先,对于文艺理论作品的大量译介,使得他在翻译的题材方面突破了以往将主要精力放在西方文学作品上的做法。他将越来越多的文艺理论作品纳入翻译视野,其读者对象群也从普通的人民大众慢慢转向革命文学者——通过更大的一个文学群体来一起促进中国的革命,并影响中国的民众。鲁迅对于苏俄文艺的关注与“革命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早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前夕,他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的革命形势,一直在思索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关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更为有效。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发源地的前苏联,并意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是,鲁迅与当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革命文学”的诸如创造社、太阳社青年革命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由于缺乏人生经验,对于革命文学的宣传更多的是建立在

满腔的革命热情之上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方面的理论基础,他们并不是很了解。而“投身其中、经历几度失败和挫折、知悉中国黑暗的根源之深”的鲁迅却是“将‘革命’作为自身的内在欲求”,他批判“‘革命文学派’的‘新’其实缺乏与中国现实真正交锋的深刻性和坚实性”。^[9]为了揭示“革命文学”的理论真相,鲁迅不仅自己大量阅读关于苏俄文艺的书籍,并且通过翻译,有选择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现代火种带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成为他现代性诉求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正如他自己所说: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10]

他希望借翻译让更多的“革命文学者”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并能够基于对革命的现实的认知,把革命当作具体的事业,来改变当时的政治现实。他多次指出:“对革命文学如果光是讲,也只是招牌而已。如今比起竖招牌,应优先考虑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进步。对唯物史观也是一样,比起发些一知半解的议论,还不如认真地搞翻译”。^{[8]56}基于这样的想法,鲁迅陆续翻译了《苏俄的文艺政策》、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卢纳察尔斯基的专著《艺术论》与《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文集《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文艺理论作品。这场“盗火”的行动不仅让鲁迅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了革命文学的真正的现代性的指导思想,也使他对文艺阶级性的认识日臻成熟。从某种程度来说,鲁迅的这些译介为当时的现代性救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11]。

同时,在这段比较集中地对国外文艺理论作品进行翻译的时期,鲁迅的翻译思想也日臻完善。虽然,他关于翻译的评论是零散的、片段的,但是,当这些零散、片段的翻译言论,尤其是他对于直译的强调,与他一以贯之的现代性救亡的诉求相遇时,我们发现其翻译思想并非不成体系。当然,这一翻译思想体系,如果摒弃了“现代性”的内涵,仅仅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是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的。例如,鲁迅在翻译这些文艺理论作品时,他不仅继续采用直译(硬

译)的原则,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竟然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译作。我们顺手拈来他所翻译的《文艺与批评》中的两个例子:“其实,老年是往往并非作为灵魂的神性化的第四的最高阶段而显现的,——这屡屡,是力的可悲的分解,是肉体的不可避免的溃灭……”;“有平静的信念的伴着创造底劳役的成年期。获得了在一切个别的事物之上的普遍性的认识的老年期,拥抱一切,否定了个人主义的残渣,好像温情的教师的老年期。”^[12]这些文字,毫无疑问,是严格按照译文源语言的词汇和句式的顺序来译的,尤其是对形容词和副词的如此堆砌之法,显然严重不符合汉语习惯。如果要读懂大致的意思,确实还需要费些周折,先要多读几遍,然后还要再去联系上下文去理解。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他的翻译,其译文质量显然值得商榷,相应地,其翻译思想也该值得怀疑了。然而,当我们把这些翻译置于他所置身的历史背景里,并进一步追问他当时的翻译理念,才能真正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鲁迅的翻译文字,是对他的翻译思想的最有力的验证: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他坚定不移的直译观;而他的翻译思想,又是其追求现代性救亡的最有力的佐证;对于文艺理论这种严肃的话题,他尤其希望能够通过直译来给读者传递原汁原味的文艺思想,并“以欧化的生涩和聱牙来打破中文的陈熟和老套,给中国文字带来一种新的参考和改观”,^[13]。对此,他曾经解释说: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14]

因此,可以看出,怀揣着现代性救亡的理想,鲁迅试图通过直译的翻译观来引介西方文艺理论,进而重构中国的“革命文学”,让更多的革命文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念,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在这种翻译思想的指导下,他对西方文艺理论作品的翻译实现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语言的新,他的“宁信不顺”的翻译思想所涉及到的,其实是他现代性救亡的宏大叙事中的一个语言现代性的命题,即对中国白话文的改革,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将另撰文讨论,在此不展开论述;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新,即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思想来影响和规范当时国内革命文学者杂乱的声音,从而指导革

命文学者创作出的真正有内涵的,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当时革命的文学作品来。

四、结 语

鲁迅一生都在追求着人的解放、坚持为人生的文学观,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绝望和希望的转变,但他对于从别国引得现代性的火种来启蒙国民,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决心和意志从未动摇。鲁迅的翻译活动,作为一次历史事件,它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立意于救亡图强,他的翻译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将翻译的理念融入到他对现实的期许中去,通过翻译来实现他追求西方现代性的理想。在他那里,翻译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和书面交流的工具,而是能够帮助改变中国现实,改造国民性的一种曲线救国的手段。基于对这种理想的认识,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在一堆看似杂乱的翻译文本、看似粗暴的翻译方法以及看似匪夷所思的边缘立场的表象下,掩盖的是译者对现实文化所持的批判立场,以及基于这种立场的、以拿来主义为指导原则、以直译(硬译)为方法、以追求西方现代性为目标的翻译思想和理念。与此同时,鲁迅在其整个翻译和文学创造生涯中,所表现出的“自觉关注精神基础问题的现代性思想,以及反复强调‘内省诸己’,‘反观诸己’的自我反思的现代性态度”^[14]也是我们今天所依然追求的,它与时俱进,永远蕴含着新意。

参考文献:

- [1] 马歇尔·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性体验[M]. 徐大建, 张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5.
- [2] 摩 罗. 中国的疼痛: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M]. 上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235.
- [3] 鲁 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4] 李欧梵. 铁屋中的呐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22-154.
- [5] 丁伟志, 陈 松. 中西体用之间: 晚清文化思潮述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53.
- [6] 李 怡.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G]//李继凯. 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 [7] 吴 钧. 鲁迅翻译文学研究[M]. 山东: 齐鲁书社, 2009: 183.
- [8] 鲁 迅. 玩笑只当它玩笑: 上[M]//鲁迅全集: 第5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48.

- [9] 丸山升. 鲁迅·革命·文学[M]. 王俊文,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8-56.
- [10] 鲁迅.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M]//鲁迅全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13-214.
- [11] 谭好哲, 任传霞, 韩书堂. 现代性与民族性: 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55.
- [12] 北京鲁迅博物馆. 文艺与批评[M]//鲁迅译文全集: 第4卷. 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302.
- [13] 陈占彪. 论“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革命”[J]. 文艺争鸣·史论, 2006(6): 72-78.
- [14] 符杰祥. 鲁迅留日时期“现代”思想的发生于形成[J]. 中国比较文学, 2009(3): 43-51.

Lu Xun'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 Demand for Modernity

XIE Hai-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s a torchbearer with profound modern consciousness, Lu Xun regarde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s a tool of his demand of modernity for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Translation ran through his whole literary activities. He attempted to bring modern thinking to citizens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a lot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rethought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ideal pattern of “founding a state” by “cultivating person”. The demand of modernity made Lu Xun place himself on the edge of the era consciously.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made in allusion to nation reform fully reflected his modern thinking ahead of the era. Meanwhile, his transl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und a real ideological weapon fo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provid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modernity saving schem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Lu Xun; translation theory; modernity; nationality;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李启正)